

骆驼：古丝绸之路的不朽象征

□ 高建新

骆驼是最能适应极端气候的动物之一，是人类最友好的朋友。骆驼运输是古丝绸之路上最主要的运输方式。在通往西域漫长的道路上，要不断穿越茫茫无际的沙漠，极耐干渴、善于行走、有“沙漠之舟”“旱地之龙”之称的骆驼，不仅成为最主要的运载工具，也成为古丝绸之路的不朽象征。

骆驼的奇特之处

《史记·匈奴列传》称骆驼为“奇畜”，奇就奇在它超乎寻常的生物特性。骆驼四肢修长，善走，役用性能良好，是乘、挽、驮的良好役畜。骆驼掌下生着胼胝状的肉垫，行走时脚趾在前方叉开，因此不会在沙面上陷落，一般可日行60~80公里，驮重150~200公斤。丝绸之路漫长，汉唐以来通往西域的三条道路，无不是戈壁连着戈壁，沙漠连着沙漠，形成绵延数千里的瀚海奇观：库布齐沙漠、毛乌素沙漠、乌兰布和沙漠、腾格里沙漠、巴丹吉林沙漠、罗布泊、库姆塔格，直至塔克拉玛干沙漠。这些沙漠大部分为移动沙漠，风来沙走，漫天黄尘，而且多为不毛之地，干旱异常，经年不见绿色，非有骆驼不能度越。骆驼极耐干旱，血液里含有蓄水能力很强的高浓缩蛋白，能吸收储存大量的水分。骆驼能在几分钟内摄入相当于自身体重（500~700公斤）1/4以上的水，而其体内水分丢失缓慢，即使脱水量达体重的25%，仍无不利影响；骆驼在没有水的条件下能生存3周，没有食物的条件下生存4周；能饮盐碱水，能以带针刺的灌木为食物，如骆驼刺；骆驼有驼峰，储存有大量脂肪，必要时可转变成水和能量，以维持生命活动。

称骆驼为“奇畜”，还在于骆驼是一种古老的生灵，有人所不及的机敏和聪明。历代史书多记载丝绸之路上有茫茫无际的沙海，夏天常有热风和沙暴来袭，给旅行者的生命安全带来巨大的威胁，当有热风和沙暴来袭时，“唯老驼豫知之，即鸣而聚立，埋其口鼻于沙子，人每以为候，亦即将毡蔽蔽鼻口。其风迅驶，斯须过尽，若不防者，必至危毙”。骆驼性怯懦而机警，嗅觉灵敏，不仅能识别气候，而且具有远距离寻找水源的功能。《博物志》卷

八说：出了敦煌向西，是茫茫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沙漠底下虽有水源，但人却不能发现，“骆驼知水脉，遇其处，辄停不肯行，以足蹋地。人于其蹋处掘之，辄得水”。

骆驼运输成就了万里丝路

塔克拉玛干沙漠东西长1000余公里，南北宽400多公里，总面积337600平方公里，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沙漠。走上丝绸之路，只有安全地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翻过葱岭，才能抵达西亚、中亚，直至欧洲。若无骆驼预警和寻找水源，旅行者是断然不能穿越沙漠的。美国学者爱德华·谢弗在《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中说：“伟大的丝绸之路是唐朝通往中亚的重要商道，它沿着戈壁荒漠的边缘，穿越唐朝西北边疆地区，最后一直抵达撒马尔罕、波斯和叙利亚……这些道路之所以能够通行，完全是靠了巴克特利亚骆驼的特殊长处，这种骆驼不仅可以嗅出地下的泉水，而且还能够预告致命的沙漠。”巴克特利亚，是古希腊人对今兴都库什山以北的阿富汗东北部地区的称呼。可以说，是骆驼连通了万里丝绸之路。

骆驼运输不仅创造了闻名于世的古丝绸之路，而且为商贸流通、东西方文化交流创造了不朽的业绩。可以这样说，没有骆驼，就没有丝绸之路；没有骆驼，丝绸之路就不会延伸如此之远。赖有骆驼移动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汉唐成就了彪炳千秋的伟业。

杜甫《喜闻盗贼蕃寇总退口号五首》其三：“崆峒西极过昆仑，驼马由来拥国门”，从崆峒山往西再往西，越过了天塹昆仑山，就是牵引驼马拥入国门的西域胡商的所来之处。这两句诗描写的就是丝绸之路开通之后、万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崆峒，山名，在今甘肃省酒泉市，唐属陇右道肃州福禄县。“拥国门”极具表现力，写出了各国使节、商人熙熙攘攘，纷纷进入国门的情景。唐王朝国力强大、经济繁荣，对外来使节、客商持开放和欢迎态度，吸引了各国商人纷纷来华经商，丝绸之路的商贸活动达到了历史顶峰。中唐诗人张籍《凉州词三首》（其一）中“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描绘的也是当年丝绸之路的动人景象：满载着中原丝绸的一支支驼队，绵延无尽，脚步坚实，伴着叮咚的驼铃声，正缓



缓行进在浩瀚的沙漠戈壁上，要抵达大唐的西部边陲——安西。“无数铃声”，写出了驼队的众多和驼铃声的密集与清脆悠长。

唐人对骆驼的赞美

丝绸之路一路向西，到底通到什么地方，中国的古代文献并没有明确记载，1970年咸阳契苾明墓出土的“三彩陶单峰驼”，却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补充。在出土的唐三彩中，双峰驼比较常见，单峰驼则至为罕见，原因是双峰驼产于亚洲寒冷沙漠地区，主要分布于唐代的北方和西北地区，如今天的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以及蒙古国一带。单峰驼，又称阿拉伯驼，产于非洲和亚洲阿拉伯炎热沙漠地区以及印度北部干旱平原，主要分布于北非、西亚，《大唐西域记·信度国》卷第十一：“橐駝卑小，唯有一峰。”古代信度国的领域，相当于今天的巴基斯坦旁遮普省南，属于西亚。此单峰驼为低温铅釉陶，高岭土胎，立于踏板之上，姿态雄壮，张口露齿，做昂首嘶鸣状。驼顶、颈部、前腿根部作成凹凸不平的驼绒状。此驼制作精美，釉色光亮，保存完好，为国内罕见，由此证明唐代的“丝绸之路”通往西亚、北非即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广大区域是不成问题的。

就骆驼对丝绸之路的贡献而言，无论用什么样的语言描述、赞美都不过分，历代精美的骆驼造型，证明了人们对骆驼的无言赞美。今天我们看到的唐墓出土的三彩骆驼，多数做昂首嘶鸣状，这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唐人在骆驼身上寄寓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渴望走向远方的心愿。齐东方先生认为，“唐代骆驼的塑造渗透了对现实生活的歌

颂和向往，不是简单的形象再现；它们或大步行走，或引颈长啸，表现出勇敢坚韧的精神，有的凄惨悲壮，像是对险象环生的恶劣自然进行着抗争。骆驼上的货袋，常常装饰着一个很大的兽头，像虎头；驼囊上的怪兽形象未必是虎，有多种不同的样式。如果对骆驼的出现、演变、形象、组合特征、兴盛和消亡的时间作系统考察，唐人对骆驼的热烈赞美无疑暗示着对漫漫丝路象征的歌颂。”从张祜《雁门太守行》诗中的“驼囊泻酒酒一杯，前头滴血心不回”看，通常用来盛放货物的驼囊，有时候也用来盛酒，古丝绸之路遥遥万里，艰辛寂寞，需伴以酒。

丝绸之路是漫漫征途，绝无平坦之路可循，跋涉者须以人畜的尸骨为路标前行，一个脚窝紧连着另一个脚窝，一匹骆驼的头紧顶住另一匹骆驼的尾，沉稳而缓慢地前行。唐代杜佑《通典》说：甘肃武威的西北有一条通往西域的捷径，但要穿越1000余里的沙漠，四面都是茫茫无际的沙漠，没有现成道路可行。要想通过，“唯以人畜骸骨及驼粪为验”。这些成为路标的“骸骨”“遗骨”“遗骸”中，有一大部分是骆驼的遗骨，坚硬如胡杨，倒卧1000年不死，依旧枝枝挺立，直指前路；又如暗夜里的明灯，照亮了风沙弥漫的丝绸之路，给在艰难中行进的人们带来生的希望。驼队，是万里沙海中唯一移动的风景；可当的驼铃，奏响的是雄伟壮阔的文化交流进行曲。



在唐朝贞观年间，出现过一起官员档案造假案，并由此引发唐太宗和大理寺少卿戴胄的一场争论。

公元626年，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登上皇位。唐太宗继位后，积极听取群臣的意见，对内以文治天下，虚心纳谏，厉行节约，劝课农桑，使百姓能够休养生息。他雄才大略，想干出一番事业来，他深知人才是关键。于是出台政策，在全国大张旗鼓地招贤纳士。一时间，多年被埋没、怀才不遇的士子们看到了希望，纷纷前来京城应聘。就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投机取巧，在个人履历上造假。那个时候，各种档案又不健全，吏部也无法一一甄别官员的档案真伪。吏部将履历造假的情况上报给唐太宗，唐太宗看后很愤怒，立即让人起草诏令，要求伪造档案的求官士子们，自诏令发布之日起来自首，说明情况，朝廷将既往不咎。如果继续隐瞒，一旦被查出来或被他人告发，一经核实，将判处死刑。

诏令发布不久，就有人举报现任徐州司户柳雄，说他伪造在隋朝时的官位俸禄等级，蒙蔽了吏部，被任命为徐州司户。司户在唐朝是主管民事户籍的官员，在州一级称为司户参军，一般为从七品；在县一级称为司户，为八品官员。柳雄为徐州司户，应为从七品官员。

朝廷接到举报后，交大理寺查处。柳雄竟然也存着侥幸心理，认为朝廷不会一一查实，就一直有自辩。大理寺经过周密调查，人证物证确凿，确认柳雄伪造官阶罪名属实，根据本有的大唐律法，档案造假应判处流放，但此时的柳雄犯了隐瞒之罪，这时已过了自首期，于是大理寺卿没有判处流放，而是按照唐太宗的诏令，将柳雄判处死刑。

这时，一个人站出来反对。他就是大理寺少卿戴胄。戴胄原先在王世充手下任职，曾因屡次谏言王世充而遭贬黜。621年，秦王李世民的征王世充，攻取虎牢关，俘获戴胄，任命他为秦王府士曹参军。唐太宗继位后，戴胄被拜为兵部郎中，封武昌县男。627年，大理寺少卿出缺。唐太宗向大臣们说道：“大理寺关乎人命，戴胄清廉正直，正是合适人选。”于是任命戴胄为大理寺少卿。可以说戴胄是唐太宗一手提拔起来的，理应维护唐太宗的面子和权威，可是，他却不仅不唯权、不唯上，只维护法律的尊严。他持反对意见的理由是，按照大唐律法，柳雄不至于定死罪，按律应判流放，不能因为皇帝一时的诏令而废了大唐律法。大理寺卿也认为戴胄说得有理，于是将案子改判流放后呈报皇上。唐太宗看后，大发雷霆，不顾一切下令要执行死刑。但是戴胄执拗得很，就是不理唐太宗的茬儿，坚持大理寺的原判。

唐太宗听了汇报后，更为震怒，将戴胄召进宫，气势汹汹地责问他：“朕刚刚发布诏令，不自首者处死，你却判为流放，这不是让朕失信于天下吗？你难道受了柳雄的贿赂要卖狱

戴胄据理护法

□ 郑学富

吗？”面对唐太宗一连串的责问，戴胄毫无惧色，他仍然坚持法律的公正性，有理有据地回答说：“臣为朝廷捍卫法律的尊严，不敢有半点私心，更不敢收取贿赂。陛下如果当即下令处死他，臣下自然无法干预。既然交给大理寺走司法程序，为臣就不敢违背法律，就要按照大唐律法来判决。柳雄伪造官阶，罪不至死，应该判处流放。”唐太宗见戴胄当面顶撞自己，更是怒不可遏，指着他的鼻子大声呵斥道：“你只顾自己遵守法律，却让朕失信于天下？你将置朕于何处？我这个做天子的还有什么权威？”戴胄毫不退让，理直气壮地反驳道：“法律是国家为布信天下人而定的，言语是一时喜怒说出来的。陛下凭借一时忿怒而杀人，其实心里也知道这样不妥，故而交给臣下依法论处，这叫作忍小忿而存大信。如果屈从个人情绪而违背法律的信用，臣为陛下感到惋惜。”戴胄一番入情入理的辩解，使唐太宗听后恍然大悟，欣然采纳戴胄的意见，并对他说：“我在法律上有所失误，你能予以纠正，朕有何忧也！”于是柳雄最后被判处流放。

戴胄坚持法理，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也是一个开明的君主，经过一番思想斗争，终于心平气和地采纳了戴胄正确的意见，维护了法律的尊严。



□ 崔 庆

公元前295年，一代雄主赵武灵王困死沙丘，赵国祸起萧墙，章何两王相争，国力大受损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一手建立了强大的机动兵团，对于秦庄襄王又有拥立之恩，秦于情理，都不愿打破两国之间的平静。而赵武灵王之后，秦再次启动了谋赵方略。

公元前283年的“完璧归赵”，公元前279年的“渑池之会”，秦的软实力在赵国那儿碰了硬钉子，在外交震慑的同时，秦国加强军备战，一切还是要靠实力说话。从秦昭襄王三十年（公元前277年）开始，秦开启了对三晋的新一轮攻伐。“秦攻赵，蔺、离石、祁拔”，赵国北部受到了极大威胁。

危险游戏

蔺、离石、祁三地形成的地理板块，由吕梁山脉直插太原盆地，三地失守，赵国故都晋阳也就无险可依了。为了取回三城，赵国居然和秦国玩起了一个危险的“游戏”：换城！战国时期，各国之间通过换城，达到各自的战略目的，并不少见，但是主动提出和秦国换城的情况还不多见。

公元前270年，赵国派遣公子卬入秦为人质，提议用焦、黎、牛狐等三城换回蔺、离石、祁三城。焦、黎、牛狐三城位于何处？史料记载，黎是古国名，春秋时期晋国重立黎侯，位置大约在现在的山西省黎城县。焦、牛狐两城详细位置未见之史

料，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两城应该和黎连成一片。虽然学界对于阏与到底在哪还有争论，但是从阏与之战前后的逻辑关系来看，阏与应该位于现在山西省的和顺县。那么，焦、黎、牛狐三城和阏与相距不远，位于赵国所属上党地区的南部边界，和韩国所属上党地区相邻。

秦国觊觎上党已非一日，赵国的提议很有诱惑力，而且身为赵国宗室的人质都来了，诚意十足。秦国很快同意了换城协议，痛快地把蔺、离石、祁三城交给了赵国。出乎意料的是，赵国得到三城后，撕毁协议，仍然控制焦、黎、牛狐三城。秦昭襄王既惊又怒，派遣公子缙向赵国索要三城，想尽量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赵臣郑朱，用一番近似调侃的对答敷衍了秦国，并表示换城协议都是一些“不令之臣”自作主张，赵王一概不知，也就谈不上认可和落实了。这已经不是协商，而是要赖。虽然秦国也用过这种伎俩，但是这种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那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

有备而来

公子缙的汇报让秦昭襄王再次震怒，倍感羞辱，和平解决换城争端的

空间没有了。虎狼之王秦昭襄王立即向胡伤军团下达作战指令，进攻赵国阏与。这里有两个问题：其一，为什么是胡伤出战？其二，为什么进攻阏与？

胡伤本是卫国人，后入秦为客卿，曾担任白起的副手，在华阳之战等重要战役中表现出色，以军功受用，阏与之战前已升任中更，是秦军后起之秀。胡伤军团之所以参战，最大的可能是，他们本来就是执行换城协议的部队，事态突变，就直接执行作战命令。从后来战事进展看，胡伤军团应是重兵集团，实力雄厚。秦国虽然原本对于换城是乐观的，但事先也做了最坏的打算。能和平换城最好，如果横生枝节，秦国是不惜一战的。

为什么选择进攻阏与呢？秦国深受赵国的羞辱，不仅想把协议中的焦、黎、牛狐三城拿下，还想把中计丢失的蔺、离石、祁三城夺回来。要达成这两个目的，进攻阏与可能是最佳选择。此处不仅地势险要，而且扼守枢纽，位于太行入陞的井陘、滏口陞之间，是连接赵国邯郸、晋阳两大板块的关键位置。此地若失，赵国将会被分割为东西两部，蔺、离石、祁三城，甚至连晋阳在内的整个赵国西部板块，都有可能落入秦国之手。

节奏之失

秦军不仅选点老辣，而且战术凶悍，胡伤军团主力直扑阏与的同时，另选偏军横插赵都邯郸的卫城武安，意在封堵可能驰援阏与的赵军，可谓滴水不漏。因此，当赵惠文王问计于群臣，宿将廉颇、乐乘都说阏与不可救，这是合乎常情的。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必有非常之策，必待非常之人。赵奢的建议，兵行险处，有如“两鼠斗于穴中”，燕赵之地的血性至浓至烈，呼应了赵王内心的不甘。于是一场惊险的节奏之战拉开大幕，赵奢开始了一场令人眼花缭乱“变速跑”。

数万赵军离开邯郸没多远，就在武安安营扎寨，和秦军相持，似乎要打持久战。在麻痹秦军后，赵奢军团突然加速，用两天一夜的时间，急行军300里，突然出现在阏与附近，并迅速占据了地区制高点北山，和阏与城中遥相呼应。

秦军攻阏与不能入，攻北山不能上，围城之军反被赵军所围，腹背不能相顾，损失惨重。秦军溃败途中，经过魏国，又遭遇激战，且战且退。更令秦军心惊的是，魏国已经河东安邑集结兵力，虎视眈眈。秦军逃进了

节点，却因轻敌自乱节奏，胡伤军团差点全军覆没。

上党之争

阏与之战，秦军惨败，对于秦国东进局势产生了重大影响。三晋乃至六国，似乎走出了宜阳之战、伊阙之战、华阳之战的阴影，打破了秦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一时之间，赵国成为合纵的领头羊，邯郸也成为酝酿联合抗秦的政治中心。

如何面对失败，是检验国家的试金石。阏与虽败，但秦未伤筋骨，一批元老宿将也还未出手。如后世李信攻楚未成，秦王痛定思痛，再用老将，以慢打快，终于灭楚。阏与之战让狂飙突进的秦国停一停、看一看、想一想。对于秦国来说，到了昭襄王中后期，扫灭六合的志向已经非常明确。在具体战略中就是“蚕食”之策，“得寸则王之寸，得尺则王之尺”。以此思维衡量阏与之战，确有冒进之处。

得天下必先取三晋，要得三晋必先得上党。上党分属赵、魏、韩三国，赵上党郡，有山西和顺、榆社以南，壶关以北，沁县、长子以东，太行山以西地区；魏上党郡有高平、陵

川以及严城等地区；韩上党郡，有山西沁源、安泽以及沁水等地区。阏与位于赵国上党郡东部边缘，与秦国山河阻隔，不如先清除魏国在河东之地零散据点，后取韩之上党，再定赵之上党，循序渐进，小步快走，最为稳健。

谋定而后动，无往而不胜。阏与之战后，秦国暂时搁置赵国，开始了对于魏、韩的新一轮频繁攻击，数年之内，赵之上党外国纷纷为秦国所有。直至韩之上党形势急迫，郡守违抗韩王之命，献地赵国。从某种程度上说，不管赵国是否接受韩国从天而降的“馅饼”，秦赵都要在上党再决雌雄，解决多年的宿怨。当赵国还在犹豫不定之时，秦军凤凰涅槃，席卷重来，对上党志在必得，一切将在长平之战有了个了结。

胡伤的名字湮没在历史之中，阏与之战的教训深深刻进了虎狼之师的心中：大兵团进行战略决战，必须注重战场地形侦察，占据地利先机；大兵团进行战略决战，必须摒除一切侥幸，构建扎实的战略纵深；大兵团进行战略决战，决不能锐气有余、沉稳不足，必须有坚定不移的战略定力。这一切将在长平之战的血与火中得到检验。

